

上下五千年

「陶郎」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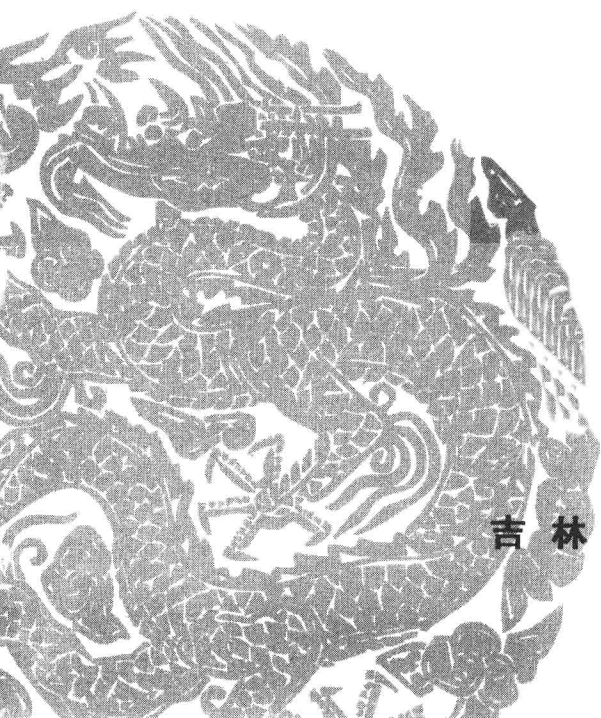
叁

上下五千年

■ 陶郎 主编

第三卷

吉林 大学 出版社



新文化运动	(61)
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64)
五四爱国运动	(66)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70)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72)
香港海员大罢工	(73)
中共二大的召开	(74)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二七惨案”	(75)
早期的农民运动	(77)
改组革命党	(77)
第二次护法战争	(78)
孙中山的伟大转变与改组国民党	(80)
西湖特别会议	(82)
中共三大	(83)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84)
新三民主义	(86)
中苏协定	(87)
黄埔军校的建立	(88)
第二次直奉战争与北京政变	(89)
临时执政府	(94)
善后会议	(95)
三·一八惨案和执政府的垮台	(96)
刺杀廖仲恺	(98)
西南军阀的演变	(99)
孙中山北上	(100)
中共四大	(101)
孙中山逝世	(102)
五卅运动	(103)
省港大罢工	(105)
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	(106)
国民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109)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	(110)





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	(111)
北伐军在湖南、湖北的胜利	(113)
北伐军在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的胜利	(115)
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	(118)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19)
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	(120)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21)
马日事变	(123)
七·一五政变	(124)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125)
第二次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政权的覆灭	(126)
国民党实现全国统一	(128)
南昌起义	(130)
八七会议	(133)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34)
黄麻起义	(137)
广州起义	(139)
湘南暴动	(144)
鄂中、鄂西秋收起义和年关暴动	(147)
广西百色、龙州起义	(150)
工农革命军第一次反“进剿”	(154)
红四军第二次反“进剿”	(155)
红四军第三次反“进剿”	(156)
红四军第四次反“进剿”	(157)
中共六大	(158)
古田会议	(160)
土地革命的开展	(161)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	(163)
“九·一八”事变	(165)
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167)
“一·二八”淞沪抗战	(169)
伪满洲国的建立	(170)



“攘外必先安内”	(172)
长城抗战	(173)
福建事变	(174)
“左”倾的冒险主义军事战略方针	(176)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177)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泛滥	(178)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长征的开始	(180)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作战	(181)
红军长征的胜利	(185)
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205)
华北危机	(211)
“一二·九”运动	(214)
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216)
对日外交日趋强硬和抗战准备	(217)
沟通国共对话以图政治解决	(218)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公布和国民大会的筹备	(219)
《八一宣言》的发表和瓦窑堡会议的召开	(221)
红一方面军东征	(223)
红一方面军西征	(228)
两广事变和绥远抗战	(234)
西安事变	(236)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238)
卢沟桥事变	(240)
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	(247)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247)
“八·一三”淞沪抗战	(248)
太原会战	(262)
南京保卫战	(273)
徐州会战	(277)
武汉会战	(281)
日本扶植下的傀儡政权	(285)
八路军出师抗日	(286)

八路军四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287)
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289)
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	(294)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	(300)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301)
国民参政会的成立及其初期活动	(302)
日本侵华策略的调整	(303)
远东慕尼黑阴谋	(304)
沦陷区的殖民统治	(306)
国统区的战时财政经济措施和成就	(309)
汪精卫叛国	(310)
南昌会战和随枣会战	(311)
第一次长沙会战	(312)
桂南会战和 1939 年冬季攻势	(313)
枣宜会战	(314)
第二次长沙会战	(315)
第三次长沙会战	(317)
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	(318)
皖南事变和第二次反共高潮	(319)
中国民主同盟的建立	(321)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322)
百团大战	(324)
沂蒙山区反铁壁合围	(325)
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抗战	(326)
敌后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328)
大生产运动	(329)
整风运动	(332)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对日、德、意宣战	(334)
《联合国共同宣言》和中国战区的成立	(335)
中美、中英“平等新约”的签定	(337)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	(339)
豫湘桂战役	(341)



中国战区军民的大反攻	(343)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根本转折	(345)
中共七大	(346)
国民党六大	(348)
雅尔塔会议与中苏谈判	(349)
美、苏对日军的沉重打击	(350)
日本投降	(351)
重庆谈判	(353)
马歇尔使华与《停战协定》	(355)
“一二·一”惨案	(356)
政治协商会议	(357)
四平保卫战	(359)
东北根据地的建立	(361)
练兵、减租、生产和土地改革运动	(362)
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军事部署	(363)
内战的全面爆发	(364)
国民大会和《中华民国宪法》	(365)
国民政府再度改组	(367)
《中美商约》	(368)
国统区人民的反美反蒋斗争	(369)
国民党的经济危机	(372)
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	(373)
《五四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	(374)
十二月会议	(376)
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土地改革总路线	(377)
辽沈战役	(378)
淮海战役	(380)
平津战役	(382)
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	(385)
和平阴谋和南京政权的覆灭	(38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389)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391)



清朝

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动

孙中山（1866—1925年），名文，字逸仙，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童年时，他听村里老一辈讲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战斗故事，就为之向往，幼小的心田里萌发出效法前辈革命英雄的愿望。1878年，他远渡太平洋，到夏威夷群岛的檀香山，同经营农牧业的大哥孙眉一起生活。在那里，他先后进入英、美基督教会所办的学校读书，接受资本主义的教育，开始产生“改良祖国”的意念，踏上了向西寻找真理的历程。与此同时，他目击美帝国主义侵略夏威夷的野蛮行径，从而对当地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深表同情。

1883年夏，孙中山回国，到香港读书。次年夏秋间，法国挑起侵略中国的中法战争。广东沿海连续发生群众打击侵略势力的事件。香港的中国工人也开展抗法运动：船坞工人坚决拒绝修理侵犯我国受创的法国军舰；驳船、码头、舂米等业工人，相约不替法国军舰搬运煤炭和粮食等，不给法国商船卸货。香港英国当局横加迫害，各业工人就群起罢工，游行示威，坚持斗争1个多月。这种情景，给亲历其境的孙中山以很大的鼓舞和启示，他感到，这“证明中国人民已经有相当觉悟”。而清朝统治者在反侵略战争中的腐败无能、屈辱妥协的行径，则引起了这个爱国青年的无比愤慨。

此后几年，孙中山先后在广州、香港的西医专门学校学习。从那时起，



他就“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致力于寻求挽救民族危亡、改革社会的方案。他多方结识倾向进步的人士，经常聚谈变革当时黑暗政治的问题。

1892年夏，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随即在澳门、广州开业行医。他设法接近具有反抗传统的会党联络清朝防营兵勇，作反清起义的准备。但是，就他那时候的思想倾向来看，主要还是期待清王朝能够接纳变法的主张。他认为，只要清政府确有变法的决心，改革封建专制政治，仿行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提倡科学技术，发展农业，振兴工矿贸易，中国也许可以富强起来。

1894年，孙中山把上述见解综合为一份详细的政见书，送给以办洋务著称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希望得到采纳。他还北上天津，求见李鸿章。可是，他的政见和希望，都落了空。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形成了一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他们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关头，积极参加爱国运动，组织进步团体，创办报纸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当时，留学日本的学生和国内爱国人士，先后创办了《国民报》、《湖北学生界》、《游学译编》、《江苏》、《浙江潮》、《苏报》、《童子世界》等等报刊杂志，广泛地传播了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揭露了清政府的黑暗统治，为资产阶级革命制造舆论。

在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中，涌现出不少卓越的宣传家。其中陈天华、邹容、章炳麟影响最大。

陈天华写了两本小册子《猛回头》、《警世钟》，以通俗浅显的文字，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歌颂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揭露了清政府的投降卖国，控诉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他大声疾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

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他极力号召：“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他痛斥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洋人的守土官长”，把中国“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他鼓动大家起来革命，“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这两个小册子，在当时“风行于世”，受到大家的欢迎，对鼓舞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起了积极作用。

青年革命家邹容，发表了《革命军》一书，无情地揭露了清政府的残酷压迫和黑暗统治，公开地指出满族贵族的腐朽卖国，是中华民族陷入帝国主义瓜分危机的根源。他热情地颂扬了民主革命，指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他极力宣传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学说。他提出了推翻清政府，建立自由独立的“中华共和国”。他明确地提出革命建国的纲领，满怀信心地呼唤：“革命独立万岁！”“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革命军》像一颗巨型炸弹，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清政府逮捕了邹容和为《革命军》作序的章太炎，查封了发表《革命军》的《苏报》，制造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邹容被判两年徒刑，不幸死于狱中，为革命献出青春。但《革命军》风行海内外，销售上百万册，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浪潮。

章太炎又叫章炳麟，是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家。他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有力地揭露了清朝反动政府的黑暗，严厉地斥责了康有为等保皇派对革命运动的诬蔑，公开痛斥光绪皇帝是“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着力宣扬革命不但可以作为“天雄大黄之猛剂”，还能成为“补泻兼备之良药”，指出了“合众共和”、“民主”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明确地表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

由于他在《苏报》上发表了这一战斗的文章，遭到了反动派的逮捕。章太炎毫无惧色，对巡捕和警探说：“余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



他认为“革命没有不流血的”。表现了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革命气概。

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猛烈地冲击着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对于鼓舞人民起来斗争，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帝国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在宣传民族主义，痛斥清政府卖国罪行的时候，掺杂着大汉族主义思想；在号召人民起来革命斗争的时候，没有认识到广大工农群众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这些都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的软弱性和所处的历史条件造成的。

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纷纷建立

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国内出现了许多小的革命团体。

1903年拒俄运动前，留日学生中的激进分子秦毓鎏等组织了一个名为青年会的小团体，参加者20余人。拒俄运动中，青年会成员都参加了“拒俄义勇队”。义勇队改称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为宗旨，俾便于公开活动。秦毓鎏曾提议改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随后，一部分会员秘密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决定回国进行实际革命活动。暗杀团成员黄兴、龚宝铨分别在长沙、上海组建了革命团体华兴会、光复会。

黄兴（1874—1916年），原名轸，号廛午，后因进行革命活动受到清政府的通缉，改名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少年时期受封建主义的教育，后来在武昌两湖书院读书，开始接触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并参与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事。1902年初，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转向革命。他先后参与了《游学译编》和《湖北学生界》的创办工作，积极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及暗杀团的活动。1903

年夏回国，在长沙的明德、经正等学校担任教员，秘密从事民主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湖南革命分子陈天华、宋教仁、谭人凤等 20 多人，于 11 月 4 日以庆贺黄兴生日为名，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成立华兴会，推举黄兴为会长，为避免清朝地方官吏的注意，对外用办矿名义，取名华兴公司，发行华兴票。1904 年 2 月 15 日，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先后参加华兴会的两湖革命知识分子有四五百人。另设同仇会为外围组织，专门联络会党。拥有会众 2 万多人的哥老会首领马福益接受华兴会的领导。黄兴和马福益商讨起义计划，取得了共同意见，决定趁农历十月初十（11 月 16 日）慈禧太后 70 岁生日那天，预埋炸弹于举行祝寿典礼的皇殿，炸死全省高级文武官员，乘势占领长沙，并在岳州、常德、浏阳、衡州、宝庆五路策动响应。同时，他们还联络外省革命人士，如期配合。这个起义计划不幸临期泄漏，清朝地方官员在各地搜捕革命党人。马福益被捕遇害。黄兴乔装逃往上海，不久转赴日本。

1904 年 6 月（一说 7 月），湖北革命志士刘敬安、张难先等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暗中从事革命活动。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在新军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科学补习所曾和华兴会取得联系，准备响应华兴会的起义。后来华兴会起义计划泄漏，科学补习所也受牵连，被迫停止活动。于是，刘敬安等利用有合法地位的教会组织——日知会，继续进行革命宣传，暗中联络同志，于 1906 年春重新组织了秘密的革命团体，名称也叫日知会。

1904 年 10 月，另一个重要革命团体光复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光复会的酝酿开始于 1903 年冬。当时，浙江留日学生陶成章、龚宝铨曾两次密商，认为日俄战争即将爆发，是进行革命活动的大好机会，应组织革命团体回国发动起义。龚宝铨到上海设立“暗杀团”机关，陶成章回浙江联络各地会党，并和华兴会取得联系，准备在华兴会发动长沙起义的同时，浙江、安徽起义响应。陶成章、龚宝铨等联合江浙一带革命知识分子 45 人，于 1904 年 10 月在上海组成光复会，推举蔡元培为会长，章炳麟在狱中与闻其事。后来，光复会在日本成立分会，参加者达数百人。

1904 年前后，各地还先后成立了其他一些革命小团体，如福建的汉族



独立会、安徽的岳王会、江苏的强国会、江西的自强会，等等。

同盟会的成立及“三民主义”的发表

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孙中山十分欣慰。他积极支持海外华侨和广大知识分子的革命活动，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在他们中间享有很高威望。1905年夏，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受到中国留日学生和各革命团体的热烈欢迎。由于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孙中山感到各革命团体分头活动，力量分散，已经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他在各革命团体领导人中间做了许多工作。宣传“互相联络”的重要，倡议成立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革命组织，以便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7月30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开会讨论建立统一组织问题。孙中山提议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讨论结果，确定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又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有些人对“平均地权”表示怀疑，经孙中山详加解释后通过。会上，黄兴发表演说，慷慨陈述革命大义，支持孙中山的倡议，并被推举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者之一。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

同盟会设计了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的组织方案。它设本部于东京，举孙中山为总理，按“三权分立”原则，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黄兴主持执行部庶务科，总理外出时由庶务代理一切，相当于协理。国内分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支部下按省设立分会，推定了各省分会的主盟人。海外华侨分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支部下按国别、地区设立分会。

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所制定的革命纲领，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中，明确指出，这次革命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

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它强调这是一次“国民革命”。

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所谓三民主义，并且宣布要将三民主义“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

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即推翻清王朝，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独立的中国。孙中山批判了革命党内存在的片面的“反满”思想，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同盟会民族主义纲领的提出，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清朝统治者，大大加速了清王朝土崩瓦解的过程。

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号召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军政府宣言》中勾画了一幅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规定国民应享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选举产生，议会由国民选举的议员组成，宪法由议会制定，人人共守。

民生主义的具体内容是“平均地权”。是防止资本主义贫富分化的一种社会政策，它反映了孙中山对劳动群众的恳切同情和对世界潮流的敏锐观察。孙中山后来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

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同盟会的纲领确实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它在与政治改派的斗争中，在动员和组织群众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它又是一个不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它主张民族主义，但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号召；它主张民权主义，但又不敢依靠广大工农群众；它主张民生主义，但缺乏使农民获得土地的内容。同盟会纲领中的这些弱点，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革命派与立宪派论战

同盟会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面派人回国发展革命组织、联络会党和新军，不断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一面创办《民报》和其他报刊，广泛宣传三民主义纲领，大造革命舆论，对保皇思想展开了斗争，在同盟会推动下，民主革命运动迅速蓬勃起来。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此十分仇视和恐惧。梁启超公然声称：“宗旨顿改，标明保皇，力辟革命，且声言与异己者宣战。”对革命派发起攻击，妄图驳倒同盟会的革命纲领，阻遏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派越来越认识到，改良派已经堕落成为清朝统治者的帮凶。只有坚决回击，革命形势才能向前发展。于是一场大论战展开了。

这次论战的中心战场是在日本。革命派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为主要阵地，由因苏报案入狱刚刚获释就被孙中山迎来东京的章炳麟担任主编。改良派主要阵地是《新民丛报》，主编梁启超。其次是新加坡。革命派在1906年7月创办《中兴日报》由田桐负责，孙中山化名“南洋小学生”，挥笔上阵，亲自指挥。改良派以《南洋总汇报》为自己喉舌，与革命派交锋。此外，在美国的檀香山和旧金山、加拿大的温哥华、泰国的曼谷、缅甸的仰光、香港等地，也都有两派报刊的论战。

这次大论战的内容很广，涉及到纲领、制度、政策这样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归纳起来主要围绕同盟会提出的三民主义纲领进行的，具体是：

第一、要不要以革命暴力推翻清王朝，即关于“种族革命”的论战，是双方论战的中心。

改良派竭力为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辩护，否认清政府所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存在，攻击革命派的民族革命是无的放矢，因而也就否认推翻清

政府的必要性。他们谈清统治者的“圣德”，是“古今至仁之政”，吹嘘“举国人民，其在律法上本已平等，无别享特权者。”

革命派用大量的事实，对改良派进行批驳，指出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一直存在。清军入关 260 余年来始终实行对汉族的压制政策，所以清帝是“一手掩尽天下泪，一人独压万人上”的罪魁。他们还揭露了清朝政府是一个投降媚外的卖国政府，顽固守旧，不思振作。“为独立计，为救亡计，”必须打倒清政府。

改良派又以革命将招致帝国主义干涉为借口，宣扬反清革命不但不能救国，反而非导致亡国不可。他们恫吓革命派必须立即放弃推翻清王朝的主张，否则“当以故杀祖国之罪科之。”

革命派有力地驳斥改良派攻击暴力革命的谬论，指出：因革命而流血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足害怕的，惟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获得民族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并强调革命是挽救民族危亡，避免被列强瓜分的唯一途径。

第二、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即关于“政治革命”的论战。

改良派为了保皇，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继续贩卖“庸俗进化论”“三世说”，认为中国必须由“据乱世”，经过“升平世”，才能达到“太平世”。也就是说，由封建专制必须经过君主立宪，才能实现民主共和制。改良派甚至仿照帝国主义的口吻，污蔑中国“民智不逮”，“既缺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缺乏作“共和国”的资格。甚至咒骂中国人民“程度未及格”，不但不能实行民主共和，也不能立即实行君主立宪，只能实行“开明专制”。他说：“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倘若实行共和，必然会引起下层社会的动乱，结果共和制度无法实行，还会导致君主专制。

革命派对于改良派反对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言论，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严正指出：“民权”之兴乃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由君主专制而为民主共和是“进化之公理”。指出：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在推翻君主专制之后，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孙中山直截了当指出：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国人民必须为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而奋斗。他说：“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乎进化之理也，是不知文明之

